

T-127.4
28

汪受宽 著

西部大开发

的

下册

历史反思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下 册

西部大开发 的

汪受宽 著

历史反思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下册)/汪受宽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311-03172-5

I. 西… II. 汪… III. 西部大开发(中国)—研究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772 号

策划编辑 陈红升
责任编辑 高士荣 陈红升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下册)
作 者	汪受宽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总 印 张	39.5
总 字 数	776 千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172-5
定 价	68.00 元(共二册)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下编 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第一章 西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3

第一节 中国人类起源地 /3

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7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 /13

第二章 西部各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19

第一节 陕西、四川、重庆 /19

第二节 甘肃、宁夏、青海、贵州 /25

第三节 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 /32

第三章 历代开发与西部经济地位的变化 /41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演进 /41

第二节 畜牧业的发展演进 /48

第三节 手工业、矿冶业的发展演进 /51

第四节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演进 /57

第五节 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的物质保障基地 /63

第六节 隋唐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柱 /70

第七节 宋朝以后,西部地区仍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75

第四章 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定富强 /79

第一节 西部经济区域特点与国家安全 /79

第二节 开辟西部疆域是周秦汉王朝自身安全的需要 /82

第三节 汉唐都畿与国家安全的屏障 /85

第四节 宋元明清的国防重地 /101

第五节 西部繁荣安定关乎国家富强 /105

第五章 历代西部开发与国家政治 /108

第一节 开发主体与开发成效 /108

第二节 开发目标——富民安民 /112

第三节 开发成败与吏治 /121

第四节 开发与人才 /129

第五节 开发与国民智慧 /132

第六章 历代开发与民族宗教政策 /140

第一节 周秦汉晋民族政策的演进 /140

第二节 从羁縻府州制度到土司制度、改土归流 /144

第三节 统治者对宗教的提倡和利用 /148

第四节 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152

第七章 历代开发与西部文化教育 /158

第一节 历代汉文化教育在西部的的发展 /159

第二节 历代西部民族教育的发展 /166

第三节 历代西部民族文化的进步 /171

第八章 历代开发与西部人口变化 /175

第一节 秦至唐的西部移民 /175

第二节 宋至清的西部移民 /182

第三节 历代西部人口演变趋势 /185

第四节 历代西部人口演变原因分析

——以移民为中心 /189

第五节 历代西部人口发展史的启示 /193

第九章 历代开发活动与西部生态环境 /196

第一节 早期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196

第二节 西部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198

第三节 农牧业转换与生态环境 /202

第四节 人口数量与生态环境 /205

第五节 建设、建筑与生态环境 /208

第六节 历代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11

第七节 历代绿化和植树活动 /217

第八节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220

第九节 战争和动乱与生态环境 /223

第十节 历代西部灾荒趋势及原因 /226

第十章 西部开发历史反思的总结 /230

第一节 西部曾经辉煌,地位极为重要 /230

第二节 古代西部经济开发主要是农牧业和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开发 /233

第三节 西部开发是国防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保障 /236

第四节 西部开发是国家政治的要求 /239

第五节 西部开发必须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 /242

第六节 兼容共存的西部文化是开发的重要动力 /246

第七节 西部开发必须以改善生态环境为要务 /249

参考文献 /259

一、古籍文献类 /259

二、著作类 /264

三、论文类 /274

下编
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第一章 西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西部的大部分自然环境很差,因而被人们视为贫穷、落后与愚昧的地区。然而在远古时期,这里以其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这里众多的远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像灿烂的明珠闪耀在西部大地上。尤其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更是以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两大源头,并皴染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西部既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化宝库。

第一节 中国人类起源地

根据古地理研究,我国远古的地理景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北,自山海关起,从东北走向西南,达甘肃省南部以南,为森林草原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丘陵地带,为森林沼泽区;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为森林区;山海关至甘肃省南部以北和以西、昆仑山、祁连山以北,为草原区;青藏高原,为高寒草原和丛林灌木区。^①今天文化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属于森林沼泽区,处在江河的下游,多洪涝灾害,自然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这一点前人已经有所认识,其中最突出的是顾颉刚先生。中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孟子对这个传说的解释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②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

^①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编著:《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2页。

^②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华书局,1980年《十三经注疏》本。

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①顾颉刚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源自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即森林、野兽与沼泽的威胁,洪水灾害,特别是钱塘江的洪水灾害所产生的对治水的急迫要求,因而孟子关于古代中国地理条件的解释,讲的就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条件。^②对中国古生态颇有研究的王玉德、张全明也说:“长江流域(主要指长江中下游——引者注,下同)的生态状况现在处于较好状况,但是,在四五千年前,长江流域生态状况不及黄河流域生态状况。长江流域潮湿,瘴气重,疟疾蔓延,人的寿命不长。长江流域的文化比黄河流域文化稍迟,这与生态状况不无关系。”^③可见,长江流域的这种自然环境比较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其文化发展也比较迟缓。

与此相反,今天我们说的西部地区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原区、森林区、草原区与青藏高原高寒草原和丛林灌木区。在远古时期,这里(除西藏之外)的自然环境比较适宜人类的生存。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与黄河上游的生态就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一样,空气湿润,植被繁茂,湖泊遍布。在黄河中上游,“由六盘山以东,直抵山、陕两省间的黄河谷,其间千数百里,都曾经被称为沃野,农牧兼宜。……黄土高原上罗列的群山。那时,这些山上都是郁郁葱葱,到处森林被覆。而山上的林区还往往延伸到山下的平川原野。这些茂密的森林间杂着农田和草原,到处呈现一片绿色,覆盖着广大的黄土高原。”^④陕西蓝田一带,在50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曾经是烟波浩渺的“古三门湖”的一部分。到了第三纪末期,这里形成了冲积平原,出现了温暖、湿润的气候。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距今80万年前的蓝田人。和蓝田人一起出土的还有虎、象、猕猴、野猪、水鹿、羚羊、狮子、大熊猫、猎豹、剑齿象、毛冠鹿等4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些带有南方动物群色彩的动物在这一地区出现,说明当时蓝田一带的气候是温暖的。^⑤根据孢粉分析,这里所呈现出来的植被为森林草原景观,阔叶林主要以桦、朴为主,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在距今10000年前的全新世期间,陕西关中地区的气候也是比较好的,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如今只能生活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的獐和竹鼠两种动物,在陕西半坡也有分布。这“显示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有如现在的长江流域”。^⑥据朱士光先生研究:“目前黄土高

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0年《十三经注疏》本。

②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见《古史辨》第1卷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④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⑤ 史念海:《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

⑥ 史念海:《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

原大体可以六盘山为界,其东是暖温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区,其西为温带半干旱或干旱气候区。推之仰韶至殷墟时代,当分别是亚热带与暖温带之气候。与之相适应,当时的植被分布状况也是大体以六盘山为界,以东为亚热带森林区。据古文献资料,下至西周时,尚有竹、漆、棕、桫等亚热带甚至热带树种生长于关中与渭北高原、陕北佳芦河沿岸丘陵山地、中条山与稷山、崤山、六盘山等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以西为暖温带草原区。”^①在距今6万—3.5万年前,内蒙古西部地区呈现出森林、灌丛草原为主的自然景观,曾经有许多湖泊和沼泽。如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最南部的城川地区,就分布着一系列古湖,“其中面积在33公顷以上者有沙那淖尔等5个”。^②第四纪全新世中期,内蒙古河套地区、阴山山脉都分布着大量的森林。

远古时期,西南地区与现在自然环境条件略有不同,但也是比较好的。早更新世初期,在四川成都盆地,生活着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小种大熊猫等多种哺乳动物,表现出热带和南亚热带动物与温带动物相混的情形。根据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兼有落叶阔叶林或常绿落叶交混林为植被特征,反映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当时的地理概貌“十分类似现代淮河流域动物区系——过渡区的面貌,南北动物于此交混”。^③170万年前,云南元谋盆地生存着元谋古猿、池猿、中国兔猴、步氏低冠竹鼠、元谋始熊猫、中国印度熊、原鼻貂、维曼始密獾、缟鬣狗、小古猫、小河四棱齿象、竹棚眶齿象、剑齿象、三趾马、元谋巨爪兽、似包氏甘地犀、猪、原河猪、丘齿麒麟鹿、云南麒麟鹿、麝、分叉角鹿、后鹿、矮小鹿、鹿、牛、羚羊等50余种哺乳动物,它们大部分生活在森林环境中。“从元谋古猿动物群生态环境分析,当时元谋盆地哺乳动物组合为森林—草原型。盆地中气候温暖偏干,水草丰富,四周森林茂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④这里分布着松、柏、榆等高大乔木,以及枫杨、桦、栎、栗、胡桃、桑、桉木、鹅耳枥、五加科、木犀、大戟科、鼠李科、藜科、禾本科、豆科、毛茛科、百合、唇形科、蓼科、卫茅科、十字花科、菊科、玄参科、石竹科、水龙骨科、凤尾科、卷柏、石松科、里白、中国蕨科等多种植物。“这……反映了元谋古猿生活时期本区古植物群落应为稀疏林—草原型。……一般年平均温度在8~12℃之间,不会超过12℃。”^⑤到了中更新世中晚期,“在云贵高原上,气候比较凉爽,湿润多雨,森林茂密”。^⑥在距今8000—3000年前,西南地区的气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温暖。在四川东部,生长着油杉、栗、

① 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第32~33页。

② 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③ 林向:《巴蜀考古与三大起源》,载《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

④ 钱方、凌小惠:《元谋古猿的生活环境与年代》,载《成都理工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⑤ 钱方、凌小惠:《元谋古猿的生活环境与年代》,载《成都理工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⑥ 王祖武等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页。

枫杨和棕榈等亚热带植物,为典型的热带阔叶林;亚洲象等热带动物也在这里生存。在川西山地,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十分繁茂。云贵高原也比现在温暖湿润,亚热带针阔叶林十分茂密,反映出十分温暖湿润的气候。到距今 3000 年左右的商周时期,西南地区气候转寒,但气候仍比现在温暖湿润。^①

西部地区在远古时期的这种比较优越的生态自然环境,为人类在中国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1984 年,我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就说过:“我赞成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我认为云、贵、川是最有希望的地方。”他进一步指出:“四川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②国际古人类学界认为,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大都位于人类起源的中心区域,这里应该是我国人类起源的地区。20 世纪考古学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从 1400 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至 400 万—300 万年前的元谋腊玛古猿,至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再至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楚的进化序列。近些年在云南又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呈贡龙潭山原“昆明人”遗址中,发现了可能为早期智人的化石;保山县塘子沟遗址中发现了接近晚期智人或现代人的化石,还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说明在旧石器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是猿人、古人及现代人活动比较广泛的地区(比黄河流域还广泛)。^③近年来还有人指出:“众所周知的‘元谋猿人’距今 170 年以上。已发掘的生活在元谋人之后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还有丽江县木家桥出土的三根‘丽江人’的股骨,距今 15 万—5 万年,西畴县东南仙人洞中的 5 枚‘西畴人’的牙齿化石,其生存年代同‘丽江人’相仿,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路南县(今石林县)板桥河沿岸则发现了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这证明云南自远古以来就一直有人类居住,而且从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到新人(晚期智人)较完整地保存了人类演化的轨迹。”^④在四川地区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重要的“出土人类化石的有资阳黄鳊溪、炉霍虾拉沱、筠连灯杆洞;出土石制品的有攀枝花格里坪和回龙湾洞、汉源狮子山和富林、资阳九曲河和鲤鱼桥、遂宁鄯口、铜梁张二塘、安岳龙台和背后河。重庆则有马王坪和桃花溪,加上巫山龙骨坡,以上共计 16 个点。”^⑤这些遗址出土的既有早期智人,也有直立人。

上述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把中国文明提前了 100 多万年,也使我国由猿到人的转化系列

① 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2 期。

② 贾兰坡:《四川史前考古的希望》,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 年。

③ 杨东晨:《先秦时期云南的民族和文化考察》,载《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④ 詹七一:《云南石器文化与民族审美萌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3 期。

⑤ 林向:《巴蜀考古与三大起源问题》,载《文史杂志》1999 年第 1 期。

近乎完整,向人类的“非洲起源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考古学家认为:“亚洲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独有的地质背景、古气候格局和有机环境,为人类起源与演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亚洲同样存在一个从猿到人的独自演化系统,巫山龙骨坡发现的巫山人,它同东非更新世能人处在同一水平上,这就标志着华夏大地有了 Homo 的最早代表。”^①据此提出了中国独立的人类演化系统: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林县人—北京人—南京人—金牛山人、和县人—大荔人—柳江人—山顶洞人。

由此,我们就可以说,西部地区是中国人类的起源地,而古猿能够在这一地区生存、发展并转化为人类,是得益于西部地区在远古时期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

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远古时期,西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为人类在这里起源提供了条件,还为中华早期文明在这里诞生提供了可能。20 世纪考古学研究表明:我国的史前文化具有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起源不仅仅局限在黄河流域,而是呈现多元的大面积多散点分布。这一观点已经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这里列举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以下六个区域:一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平原;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五是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②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以下六个区域:一是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遍及陕西、山西、河南全境的中原文化区;二是包括甘肃和青海东部的甘青文化区;三是包括山东丘陵及其附近平原地区的山东文化区;四是包括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燕辽文化区;五是长江中游文化区;六是长江下游的江浙文化区。^③

第三种意见认为,史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划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这些文化中心在南北方文化的过渡带,即今日东部季风区陇海线的南北地带形成了南北方文化的交错区;在东西文化区之间,形成了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之间的东西交错文化,即前述东西过渡文化。在这两条过渡带文化

① 黄万波:《从巫山龙骨坡文化探索人类的起源》,载《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 年第 6 期。

② 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02~150 页。

③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4 页。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

区的交汇区,则成为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即今日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发达区。正因为这种文化间的交错性,使之成为后来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即所谓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①

第四种意见认为,“黄河、长江、珠江、辽河以及它们的分支水系汉水、汾水、渭水等,都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多元文化建构了中华大文化。”据此将当时中国文化分为黄河流域的上游甘青文化区、黄河中游的中原华夏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山东文化区,长江流域的上、中、下三个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②

上述几种观点表明,西部地区也是中国早期文化的发源地,同时,20世纪中国大量考古发现也证明,西部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带,在我国考古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陕西史前文化。陕西按地形可分为三大区域:北部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逶迤起伏,延绵相连;南部是鱼米之乡的汉中盆地,山川秀美,气候宜人;中部是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河流纵横,一片沃野。巍峨险峻的秦岭山脉将关中与汉中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单元,而黄土高原也与关中平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陕西史前文化也具有地域性的差异: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中南部属于中原文化区,汉中属于长江中游文化区,黄土高原北部与内蒙古高原相接地区则属于燕山南北长城沿线文化区。

陕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为我们认识远古时期陕西文化提供了条件,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陕西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在陕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28处,其中著名的有1963年发现的“蓝田猿人”,距今80万—75万年;1978年发现的“大荔人”,距今18万—14万年,“属直立人向智人过渡时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所见最为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③1975年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黄龙人”,正处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时期。

最新调查统计资料显示,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多达3306处。关中分布最为密集,其次为陕南、陕北。1955—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华县老官台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958年和1959年进行复查和试掘,命名为“老官台文化”。这一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流域及其支流,包括陇东、豫西及丹江上游地区。主要遗址除老官台外,还有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临潼白家村等遗址;在宝鸡北首岭遗址下层、长武下孟村遗址下层、商县紫荆遗址下层及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下层,也有发现。^④根据碳-14年代测定来看,老官台

① 王祖武等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② 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③ 维长安:《20世纪陕西考古发现述略》,载《文博》2001年第1期。

④ 陕西考古学会:《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页。

文化的年代距今 8000—7000 年,较仰韶文化测定年代为早。可见,老官台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阶段的遗存。紧接老官台文化的是在中原地区分布最广的仰韶文化。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渭水流域,现已发掘的规模较大的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稍后的龙山文化在陕西关中的泾、渭流域也多有发现,早期以庙底沟二期为代表,后期以客省庄为代表。

20 世纪 60—80 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先后发现西乡县李家村和南郑县龙岗寺 2 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据科学测定,距今年代分别在 7500 年和 6500 年左右。其中龙岗遗址中大量的水稻碳化遗物以及红陶器皿,李家村遗址中造型精美的骨雕人头像等,都颇受考古学界重视,在“文革”后中国第一届考古学年会上分别被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与“龙岗文化”,并且还被农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水稻起源于长江中游的重要证据。此外,在汉江沿线的安康、郧西、竹溪、襄樊、南阳、枣阳一带也发现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些史前文化带有明显的从半坡仰韶文化向屈家岭文化过渡的特征。陕西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新石器时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

甘青史前文化。甘青地区现已发现的较早史前文化是大地湾文化。该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东部秦安县北 40 公里。大地湾遗址以其丰富的遗存、众多的陶器与规模宏大的房屋建筑而著称。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经测定为距今 7800—7350 年之间。继大地湾文化而起的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是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内容相当丰富。由于马家窑文化有较多的彩陶,所以过去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①实际上,它是黄河上游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其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流域汉川县地区。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已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 400 多处。^②从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来看,有早晚之分。早期略晚于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仰韶文化。据马家窑文化较早的石岭下类型的碳-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3813 ± 175 年,距今约 5000 年,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稍晚阶段。马家窑文化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了 100 多座陶窑和几万件陶器。可以说,马家窑文化以其发达的彩陶业,向人们展示了甘青在远古时期的辉煌文化。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在甘青地区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东起渭水与泾水上游,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部的湟水流域,北达宁夏和内蒙古的南部,南

① 安志敏在《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就将“马家窑文化”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之“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

② 安金槐:《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03 页。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

到汉水上游。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 4200—3900 年,大约与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当。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已有人殉现象,说明该文化已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年代可能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齐家文化发现的铜镜也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的人们不仅发现、使用了红铜和青铜,而且在冶炼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由于在刀、斧等铜器上留下有铸范痕迹的例证,表明齐家文化的人们已经认识了金属的性质,运用锻造和铸造来制作出各种不同用途的铜器。齐家文化冶炼如此繁荣,为中国商、周时代灿烂的青铜文化奠定了基础。”^①

内蒙古、宁夏与新疆史前文化。内蒙古地势辽阔,东西跨度大,其东部与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一起构成了燕辽文化区。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为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因 1935 年首先发现于现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下层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又发现了许多红山文化遗址。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是:北起内蒙古昭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辽宁朝阳、凌源和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与锦州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还有赤峰水泉、蜘蛛山、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敖汉旗三道湾子、四棱山、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红山文化的年代,碳-14 测定为距今 5000 年左右,应属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红山文化的居民,不惜耗费众多劳动为代价,为埋葬和宗教信仰修建祭坛,塑造出众多的女神像,制作出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陶器。”^②这无疑对我国古代的庙坛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稍晚于红山文化而出现的是富河文化,因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而得名。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已发掘的还有林东的金龟山和南杨家营子等遗址。富河文化的年代,据碳-14 测定为距今 5000 年左右,约和红山文化中晚期相当。

内蒙古西部与宁夏、新疆构成了我国北方沿长城一线细石器文化。1979 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发现阿拉善遗址。该遗址共分三期:一、二期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三期相当于龙山文化。宁夏地区除分布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外,在黄河以北地区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细石器文化。如贺兰暖泉遗址、陶乐高仁旗遗址,都曾发现大量经过加工的细石器以及砂质褐陶、泥质红陶、砂质灰陶、泥质灰陶与彩陶的碎片。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细石器与磨制石器为多。

四川、重庆史前文化。四川、重庆即古巴蜀之地。20 世纪前中期考古界对四川、重庆地区的发掘、研究都相当不足,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在这一地区陆续地发掘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展现了巴蜀古文化的瑰丽。其中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主要有广元

① 王祖武等编:《中华文明史》第 1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39~40 页。

② 王祖武等编:《中华文明史》第 1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88 页。

中子铺遗址、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鲁家坟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月亮湾遗址一期,以及新津宝墩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尤其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之多,器物之精,都为世所罕见。在重庆地区,则发现有类似城背溪文化遗存的丰都玉溪遗址,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巫山大溪遗址,以及带有较强地方性特征的哨棚文化。^①

云南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器出土点,在云南已发现 300 多处,广泛分布于 30 多个县,分洞穴遗址、台地遗址两类。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发掘的有滇西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滇池周围的晋宁石寨山遗址和昆明官渡遗址等,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甚多。李绍连先生说:“云南西部洱海之东的宾川县白羊村遗址,位于金沙江支流宾居河畔,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出土一批磨制精致的农具,如梯形石斧、石镞、半月形穿孔石刀和蚌刀等,联系到一些窖穴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和稻秆的痕迹来看,这是一支以种稻为主的农业部落文化。此地山林中动物繁多,在务农同时还利用装上柳叶状无铤石镞,获取鹿、野猪和黑熊等动物,这些活动在遗址中留有遗物。在该遗址还发现房屋基址 11 座,均为地面长方形建筑,其建筑方法与河南仰韶文化的建筑相似,即挖基槽立木柱,充填牢固后在各木柱间捆上荆条、小树枝之类作墙骨,再在表里涂抹草拌泥为墙。不过,也有一种在地面直接垫础石立柱的简便方法是在中原罕见的。居住饮食用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灰陶较少,均为手制;器形主要有圜底罐、钵、匜,以及少量的壶和支垫;器表纹饰比较简单,多为划纹、绳纹和篦点纹。”^②这个遗址的年代,经测定距今 4115 ± 105 年,相当于中原河南龙山文化末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元谋大墩子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1260 ± 90 年。

贵州史前文化。贵州也是我国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1964 年考古学家在黔西发现了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观音洞文化遗址。1979 年又发掘了距今 1 万余年的穿洞文化遗址,并将当时活动在这里的古人称为“穿洞人”。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处在试掘和发现阶段,目前发现的仅有林章县的可乐区、威宁县的中河区、毕节市的青场乡和平坝县的飞虎山。^③

广西史前文化。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年来也有不少发掘与发现,主要为洞穴遗址与贝丘遗址。其中内容最为丰富的是位于桂林市独山西南麓的甑皮岩洞穴遗址。该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 7000—前 5500 年。

西藏史前文化。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地区的考古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1967 年地

① 江章华:《川东长江沿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分析》,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2 期。

② 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69~270 页。

③ 简小娅:《贵州的新石器文化》,载《文史天地》1995 年第 2 期。